

孙庆增其人及其书

谢灼华

一、孙庆增身世略考

江苏藏书家孙庆增以《藏书纪要》闻名于世，但关于他的身世，确乎文献不足，语焉不详。清嘉庆辛未（公元1811年），黄丕烈在出版《士礼居丛书》时，曾提到孙庆增。光绪甲辰（1904）排印的《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二藏书家列有孙从沾（添），略述孙生平及著作。杨复古、缪荃孙诸人对孙的身世有所涉及。总之，对于孙庆增的基本情况，还是记载不多的。这里，根据有关文献，对孙庆增生平略作考证，并望有识者指正和补充。

孙庆增，字从添，一字石芝，江苏常熟人，清初著名藏书家。其《藏书纪要》卷首自称“虞山上善堂庆增氏孙从添笔。”又按《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孙有《春秋经传类求》等著作。光绪《常昭合志稿》记载，又有《活人精论》、《石芝遗话》二书。

“余无他好，而中于书癖，家藏卷帙，不下万数。虽极贫，不忍弃去。……数年以来，或持囊以载所见，或携篋以志所闻，念兹在兹，几或一老蠹鱼矣！（《藏书纪要·卷首语》）

这是孙庆增自己提供的藏书事实，但因无年月记载，无法判断其生活时代。

“孙从沾，字庆增，号石芝，诸生。善医，用药出入意表，妇孺呼为孙怪。侨居郡城，大吏皆器重之。有书癖，家虽贫而所藏愈万卷，……其藏书室曰上善堂，所藏书有其名字朱记，另有一印钤于尾曰：‘得者宝之’。”（光绪《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二）

“孙庆增所藏书，余家收藏不下数十种，其所著述，未之闻也。此《藏书纪要》，言之甚详且备，盖亦真知笃好者。”这是黄丕烈于嘉庆十六年（1811）刻印《士礼居丛书》对《藏书纪要》一书所跋语，黄丕烈曾收得孙庆增遗书数十种，证明孙富收藏。

“右藏书纪要一卷，孙庆增撰。庆增字从沾，一字石芝。常熟人。性嗜书，兼收藏、赏鉴两家，所记皆甘苦之言，益人识见不少。”

（《藕香零拾》本《藏书纪要》跋）缪荃孙是清末人，对孙庆增的情况了解不多。

最早提供孙庆增身世信息的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编者。

“《春秋经传类求》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国朝孙从添，过临汾同编。从添号石芝，常熟人。临汾，长洲人。是书始刻于乾隆己卯”。

按《四库全书总目》编例，书籍排列次序除突出历朝帝王之书，“其余概以登第之年，生卒之岁为之排比。或据所往来倡和之人为次。”孙从添之《春秋经传类求》一书，是与《春秋集古传》、《春秋义解》、《读左补义》及《春秋一得》排列在一起，这些书的作者，《春秋义解》作者刘梦鹏是乾隆辛未（公元1751）进士，《读左补义》作者姜炳璋，是乾隆甲戌（公元1754）进士。《春秋一得》作者阎循观是乾隆丙戌（公元1766）进士。《四库全书总目》把《春秋经传类求》一书排在《读左补义》和《春秋一得》两书中间，主要依据是该书刻于乾隆己卯（1759），即1754至1766年间的可考年代，故作此排列。孙从添是诸生，无登第之

年可记。毫无疑问，孙从添在编写《四库全书》时已作古矣！

还是黄丕烈在《士礼居丛书》中对《藏书纪要》所作跋语提供了比较重要的情况：他说《藏书纪要》一书：

“余得诸郡中陈氏，陈固得于金心山，心山为文瑞楼后人，所传授必有自矣。余因是书所记藏书之要，皆先我而言之者，遂付梓以行。……孙公去世未远，周文香岩幼年曾见之，时已七旬余，兼善医术，其所藏书，铃尾一印曰，得者宝之。”但是，黄丕烈对孙庆增的著述，仍然“未之闻也”。

黄丕烈，乾嘉著名藏书家，生于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卒于道光五年（公元1825），《士礼居丛书》中《藏书纪要》跋语写于嘉庆辛未（公元1811年），他提供了二则重要材料，得孙庆增遗书数十种，说明孙的藏书散失应在十八世纪期内。又说周香岩曾于幼年见过孙庆增，时已七旬余。据此，孙庆增的活动年代可根据周香岩的身世加以推测。

周香岩，原名锡瓚，字仲涟，号漪塘，又号香岩居士，清吴县人。与黄丕烈有同嗜，从迹甚密。堯圃（黄丕烈）每购一书，必往借所藏秘本证之。嘉庆己卯年卒，年八十有余。前引黄丕烈称“香岩幼年曾见之，时已七旬余”。周香岩卒于嘉庆己卯（公元1819），周在世八十有余，则生于公元1735—1740年左右。这是就周香岩在世八十五岁计，即生于乾隆初年。

周香岩生于乾隆初年，他幼年曾见孙从添，一般称幼年，指十岁以内吧？那时孙庆增已七旬余，据此上推，孙庆增大约生于康熙初年，约康熙十年—十五年（1671—1675），因此，如果孙生于康熙十年（1675），周香岩幼年见之七旬余，即估计公元1745年时尚在世，那时周香岩幼年才得见之。因此，可初步推断，孙庆增生于康熙初年，死于乾隆初年，如果高寿八十有余，即

死于乾隆十五年（1750—1755）左右，主要活动于康、雍、乾间。

这种推算方法是否还有旁证呢？

《藏书纪要·钞录》中称“明人钞本，吴门朱性甫、钱叔宝、子允治手钞最富，后归钱牧翁，绛云焚后，仅见一二矣。”钱谦益的绛云楼焚于顺治庚寅（公元1650年），说明孙庆增知绛云楼之灾，此为十七世纪中叶事记入作者书中之例。

《藏书纪要·鉴别》中称：“本朝所刻之书，有御刻精刻，可与宋竝。惟《全唐诗》虽极精美，惜乎校正犹未尽也。”《全唐诗》是清廷组织编纂的，此书始编于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刊成于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孙庆增提到此书，并进行分析比较，当在十八世纪初年的事。

《藏书纪要·钞录》中称：“近时钱遵王有五彩著色画本《香奁集》，白描《鹵簿图》、《营造法式》、《营造正式》等书，虽弗及前人，今亦不可得矣！”按此，首先肯定钱遵王经营之钞书质量较高，钱遵王生于公元1629年，卒于1701年。这些钞本是钱死后流传，孙庆增看到这些也是十八世纪的事，证明孙十八世纪初年在世。

《藏书纪要·鉴别》中称“而本朝又有《说铃》、《学海类编》《昭代丛书》，亦当查清记出。”按此，《说铃》是吴震方编，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续集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序。《昭代丛书》，张潮编，有康熙中刊本。《学海类编》，曹溶编，曹溶死于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以上书例孙庆增都有所征引，也可证明孙是十八世纪初在世的。

孙庆增之著作，有《春秋经传类求》十二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与过临汾合作。《藏书纪要》，最早收入《士礼居丛书》。《上善堂书目》一卷，《清史·艺文志·史部》著录，作孙庆增撰。《上善堂书目》一卷，《清史艺文志补编·史部》著录，

作孙从添撰。又《上善堂宋元版精抄旧抄书目》一卷，《西谛书目·史部》著录，作孙从添撰，其实就是《上善堂书目》。

大致可把孙庆增生平事迹简述如下：

孙庆增，字从添，一字石芝，江苏熟人。约生于康熙初年，卒于乾隆初年，诸生。生平业医，因用药出人意表，世人呼为“孙怪”。有书癖，家藏逾万卷。与同郡藏书家相互参阅善本，校勘异同，故家藏书版本优劣，钞本粗细无所不知，且眼界甚高，真伪能辨。兼收藏、鉴赏两家，家藏以经史为上，子集次之，但各类图书兼容并蓄。主张藏书“利济学术”，对图书选择鉴别颇严。有《上善堂书目》传世。又积累藏书管理经验，参考诸家治书方法，撰成《藏书纪要》一书，同好评为“甚详且备”。另有与过临汾合撰《春秋经传类求》，《四库总目》经部存目。又撰有《活人精论》和《石芝遗话》。家藏图书钤有名字朱记及“得者宝之”印记，藏书散出后，黄丕烈得数十种。

《（光绪）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二藏书家有传。

二、《藏书纪要》的出版与流传

孙庆增所著《藏书纪要》，原来是作为自己藏书管理之参考而写作的，估计是因为他在书林中见识广博，鉴别收藏颇得门道，故得到同时藏书家之重视与尊重，要求他传授经验，即他所说的“同志欲将其要，窃不自量，记为八则。”所以，参酌前辈经验，学习有关著作，总结自己作法而写成此书，但是，始终为他自己所不料，此书流传出去后，多方刻印，流传甚广。

首先谋刻该书的是金氏文瑞楼，原准备刻于《文瑞楼书目》后，但该书目刻出后并未附《藏书纪要》一书，原因不明。但此书流传于藏书家，如《藏书纪要》正文末有题识云：“《藏书纪要》，壬子夏心山先生

所赠，余素有书癖，而力不迨，后人有志于此，观此八则，庶不负徒有插架之名也。嘉平十一日，谦识。”此壬子（估计为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因黄丕烈在《士礼居丛书》中作跋：称“余得诸郡中陈氏，陈因得于金心山，心山为文瑞楼后人，所传授必有自矣！”

这个陈氏是否是前面题识之“谦”，不敢断定，但文瑞楼是金檀之藏书楼，清初浙江藏书家，心山是金檀之孙，金檀在雍正间还刻《高青邱诗集》，其孙活动在乾隆末年是不可能的。

《藏书纪要》刻于丛书中首推黄丕烈之《士礼居丛书》，此书刻于嘉庆辛未十六年（公元1811年），黄丕烈称“此《藏书纪要》，言之甚详且备，盖亦真知笃好者。”正因为全面而详尽地论述了藏书，整书，保护书籍之切要之言，黄丕烈认为“皆先我而言之者，遂付梓以行。”黄丕烈还认为，孙庆增有一藏书印曰“得者宝之”，说明了孙庆增是主张藏书不应自私，应公诸同好，所以盖藏书印曰“得者宝之”，即得到这些书应与原藏者同样珍护，冀得文化遗产赖以流传。黄丕烈刻出此书，也是有同样心情的。

黄刻次年，《昭代丛书》续编者杨复吉，又立即把《藏书纪要》刻入《昭代丛书》，杨复吉对《昭代丛书》中《藏书纪要》作跋称“前明祁承爐《澹生堂藏书记》，论聚书购书鉴书之法，至详且悉。”而《藏书纪要》一书，“亦言之津津”，即与《澹生堂藏书记》有同等性质。杨复吉特别叹息历代藏书家聚久必散，聚不易，而散则易，他对此书校阅之下，不禁三叹。所以，他刻印的意思也是希望此书能为藏书家之参考，使藏书得以保护流传而久不散失。（杨作跋于嘉庆壬申十七年，即公元1811年）。

此后，《藏书纪要》分别被编入各种丛书中，如《花近楼丛书》，管廷芬辑。《述古丛钞》第一集，刘晚荣辑，同治光绪间刘

氏藏修书屋刊行。《榆园丛刻》附，许增辑，同治光绪间刻。《藏修堂丛书》第四集，刘晚荣辑，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刊。《藕香零拾》丛书，缪荃孙辑，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刊。《潘刻五种》，恩寿辑，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据同光间吴县刻本刊。《翠琅环馆丛书》子部，冯兆年辑，刻于光绪中。民国间有《艺术丛书》杂品，民国五年保粹堂据清光绪中翠琅环馆重印。

《芋园丛书》子部，黄肇沂辑，民国二十四年，南海黄氏据旧板汇印本。

解放后，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印行《藏书纪要·澹生堂藏书约》合印本，补充了一些内容，改正了脱误之处，是较好的一种。

《藏书纪要》一书，从上引的丛书，单刻情况看，是颇受藏书家重视的。

廿世纪前后，藏书家开始评论《藏书纪要》的得失，补充《藏书纪要》之失误，或仿效《藏书纪要》之体例进行写作，有些著作则开始评价此书之价值，综而论之，约有四端。

一曰补充，如《藕香零拾》本中缪荃孙补充说明宋之刻本之鉴定依据，或作伪手伪，评定孙记载之不足，使之更臻完善。缪荃孙称“《藏书纪要》所记皆甘苦之言，益人识见不少，”评价是相当高的，并于书中加案话，也是有价值的。

二曰仿效，如叶德辉之《藏书十约》，基本是仿照孙书体例写成，并推崇孙书是“收藏之指南”、“汲古之修绠”，因此，他结合近代典笈聚散，购聚困难之情况扩充、增加、修正孙说，虽然是一种新的体系，但应该看成是《藏书纪要》影响下出现的。

三曰引用，如《藏书绝句》中杨守敬议论各种版本时，引用孙说甚多，亦是明证。

四曰评述，如《古今典籍聚散考》中，陈登原多处说明孙之见解是可取的。谭卓垣在论文中亦论及孙书之影响。至于关于校

勘，版本的著作论文中评述孙的观点，那就更多了。

三、《藏书纪要》之内容和价值

孙庆增从读书、藏书的长期实践过程中，认为书籍是“天下之至宝”，而又是“人身中之至宝也”。他说：“夫天地间之有书籍也，犹人身之有性灵也。人身无性灵，则与禽兽何异。天地无书籍，则与草昧何异。故书籍者，天下之至宝也。人心之善恶、世道之得失，莫不辨于是焉。天下惟读书之人，而后能修身，而后能治国也。是书者，又人身之至宝也。”（《藏书纪要·购求》）正因为他认为书籍是天下之至宝，是人身中之至宝，所以，他一生孜孜以求，精心收藏，整理编目，使书籍致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又总结经验，写成图书管理的专门著作《藏书纪要》。

孙庆增的“天下之至宝”、“人身之至宝”的认识，是有鲜明的阶级烙印的。因为他认为书籍的作用是“圣贤之道，非此不能考证。”也就是说，主要服务于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的学习与研究，所以，他收藏图书的重点，也是很突出儒家经典著作。“藏书之道，先分经史子集四种，取其精华，去其糠粃。经为上，史次之，子集又次之。”

（《藏书纪要·鉴别》）这是就藏书内容上的先后来说的，因此，藏书目录也仿照传统四部分类，以经史子集区分，从这一点上看，往往限制了孙庆增在藏书建设上所能达到的成就，这是封建社会私人藏书家的普遍缺陷。

《藏书纪要》在藏书的购求、鉴别、抄录、校雠、装订、编目、收藏、曝书八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大致分析出来，可以下面四点看出其贡献。

（一）藏书购求与鉴别问题

私人藏书主要靠藏书家长期搜集、补配、

抄写等方法补充自己的藏书。孙庆增在讨论藏书购求与鉴别的工作时,分析了藏书购求之实际困难,总结了实践中的经验,反映了图书购求上的一些基本问题。

他首先提出了购求图书是最难事。

1. 经济能力问题

他认为“知有是书而无力购求,一难也。力足以求之矣,而所好不在是,二难也。知好之而求之矣,而必欲较其值之多寡大小焉,遂致坐失于一时,不能复购于异日,三难也。”(《藏书纪要·购求》)这所指三难,实际上是牵涉到经济能力问题,从私人藏书家的经济能力分析,一部分封建官僚和乡村豪绅,他们在这方面是困难较小的,所以,他们一般都不存在有书而无力购买的问题。明末毛晋榜示于门,宋版本按叶计价,就是明证。但身为乡村医生,家境不甚宽裕的孙庆增,有书不能立致,在藏书积累过程中是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推而广之,图书采购上如何适时采购,合理使用经费,使之得其所用,用得其所,确是应该注意的。

2. 知识水平问题。

知识水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应该掌握出版信息,一是应该具备书的知识,这样才能作好图书采购工作。孙庆增当时碰到的问题是“不能搜之于书肆,不能求之于旧家,四难也。但知近求,不知远购,五难也。不知鉴别真伪,检点卷数,辨论字纸,贸贸购求,每多缺舛,终无善本,六难也。”(《藏书纪要·购求》)这里所说的三难,就是出版信息和图书质量的问题。不了解出版信息,不知从何购进,不了解图书知识,无鉴别版本经验,又往往以假作真,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针对以上情况,孙庆增在《藏书纪要》中提供了了解出版情况和图书质量的办法。

第一,了解出版家藏书家情况。

他说“大致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虞山、崑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金陵、新安、宁国、安庆及河南、北直、山

东、闽中、山西、关中、江西、湖广、蜀中亦不少藏书之家,在其人能到处访求,辨别真伪,则十得八九矣。”(《藏书纪要·鉴别》)封建时代藏书家有兼出版家的,所以某地藏书家多,则图书流传较多,同时,藏书家经常采取互相调配的办法,通过等值与不等值的互相交换、购买、赠送,能得到珍本、善本,故孙庆增强调了解藏书家的情况。

第二,通过书目工具鉴别图书质量。

孙庆增认为要了解某书系何朝何地著作,刻于何时,何人翻刻,何人钞录,何人底本,何人收藏,如何为宋元刻本,刻于南北朝何时何地(指宋金元之间)如何为宋元精旧钞本,必须认真分析鉴别。这也就是说要有图书版本知识和水平,但是,往往通过眼力鉴别还不够,还要通过多种工具加以查对,“再于各家收藏目录,历朝书目、类书总目、读书志、《敏求记》、《经籍考》、志书、文苑志、书籍志,二十一史之书籍志,名人诗文集书序跋文内查考明白。”(《藏书纪要·鉴别》)如此过程,他认为版本鉴别的问题大致可以解决了。

对于版本鉴别问题,孙庆增认为是藏书中最重要,的,不知鉴别,犹如瞽之辨色,聋之听音,所以在《藏书纪要》的“鉴别”一则中,他不仅提供了版本基本知识,而且还总结了版本鉴别的基本方法。

他提出了版本鉴别的方法是“凡收藏者须看其板之古今,纸之新旧好歹,卷数之全与缺”,这是基本方法。然而,鉴别版本在判断时代上又是首要的。他认为“鉴别宋刻本须看纸色、罗纹、墨气、字划、行款、忌讳字、单边、末后卷数,不刻末行、随文隔行刻,又须将真本对勘乃定。”(同上引)他从长期的实践中认为“若果南北宋刻本,纸质罗纹不同、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所谓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宋刻之妙尽之矣!”

(同上引)但光是字面理解是鉴别不了宋元

版的,所以他补充了两种办法,一是将真本对勘,二是利用明人集纳之本对勘,只有这样才能不致失误。

为了使购求和鉴别上参考,孙庆增列举了比较多的善本珍本名目,以便其他藏家之参考。如“十三经蜀本为最,北宋刻第一巾箱板甚精,其次南宋本亦妙。”“北监板无补校初印亦可。”这是就经部善本而言,“十七史宋刻九行十八字最佳,北宋本细字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每精美可爱。南北朝各家经史汉书,字划最精,其十七史北监板无补版初印本亦妙,宋辽金元四史以初印好纸者为佳。”(上引《藏书纪要·鉴别》)这是就经史中珍本善本而言。比较官私刻书中何者为优为劣,国内外刻本中何者为优为劣,真假刻本中何者为真,何者为假等一系列实际经验,孙庆增亦多方列举,都可供我们参考。

在图书购求上注意版本好坏,当然是重要的,但同时不应忽视书籍内容质量,只有这样才能兼收藏与赏鉴两家之美。孙庆增还提出了应该注意购求的全面性。

他在注意购求所谓正经正史时,提出应购求属于经史之补充的书。如“经史中有疏义、注解、图说、论讲、史断、互考、补缺、考略、刊正谬俗、稗官野史、各国春秋传载、音释句解者,当细心鉴之。”(《藏书纪要·鉴别》)

除了经史类著作,他认为“至于杂记小说偶录之书,有关行谊,考据学问政治者,细绎而收藏之。述古文词翰苑经济之文,小学字学韵学,山经地志游览,技艺养生博物种植岁时医卜九流杂技之书,有关利济学术者,亦需留意”。(《藏书纪要·鉴别》)

明代以后,坊间刻本中丛书甚多,丛书有些积累文献至可宝贵,或有单刻本难得而丛书中保留的孤本善本,更重要的是系统的积累了某一门类的图书,所以,丛书收集是藏书家的重要工作。孙庆增有识于此,他

认为“又必于《稗统》《百川学海》《眉山秘籍》《文焕丛书》《汉魏(丛书)》、《唐宋丛书》、《夷坚志》、《津逮秘书》、《邱林学山》、《顾氏四十小说》、《皇宋四十家小说》、《皇明小说》等书,择其卷数完全刻本,与宋本、旧钞、秘钞本对明卷数字句同与不同,一一记清,以便检不全而未备者弃之,只有全面精美者收藏之。”

(《藏书纪要·鉴别》)孙庆增在此,注意选择丛书中较佳者收藏,又注意全面精美者收藏,体现了藏书建设中不贪多求全,注意藏书质量的提高,这种看法是难能可贵的。

如果按孙庆增对图书购求的论述,综合起来,作为图书购求的比例是“重经史,其次子集。”实际上,就是“经为上,史次之,子集又次之。”(《藏书纪要·鉴别》)

在研究购买图书种类的比例上,孙庆增还说明了藏书购求的实用性,这里,他不仅从图书类别上明确主次,保证藏书的完整性,而且还从图书类别上分清重点与一般,从而确定了图书购求上的多样性。

图书购求总原则是,凡是经史子集四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孙庆增在这点上,首先是从板本之优劣为标准的。宋元的刻,又是稀世之宝,自应全面收藏,而明刻各板,即应论刻本好坏,特别注重原刻原印,一定要注意刻本较好,校勘较精者。但是,在选择图书中,还有经史著作的注释,考证、图说以及稗官,野史、载记,对这些著作形成的书,应做到“细心鉴之”,即慎重选择,精心挑选。这是从收藏种类上不可偏废,但收藏品种上应视图书质量而定,泛收是没有好处的。

对于子集类著作,孙庆增贯彻“利济学术”则“细绎而收藏之”的标准。所以,他认为“杂记小说偶录之书,有关行谊,考据学问政治者,细绎而收藏之。”“述古文词翰苑经济之文,小学字学韵学,山经地志游览,技艺养生博物种植岁时医卜九流杂技之书,

有关利济学术者，亦须留意。”“文辞诗集、文集词曲、碑记、性理语录、子书小说等，皆当择其最上者收藏之。”（《藏书纪要·鉴别》）以上的各类著作，当时出版量很大，品种也是多样，一个藏书家既无可能全面收藏，也无必要做到无遗漏的购求，这一点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藏书贵在实用，也是宋代以后很多藏书家宣传的观点，孙庆增接受藏书贵在实用的主张，在图书购求的具体工作中，研究了除经史类著作外，对各类著作选择鉴别的总标准是“利济学术。”

“利济学术”是从“经世致用”的主张中得到启发的。但它在书籍选择、利用上的指导意义就更为直接了。

从图书购求上贯彻“利济学术”的原则，即定出了藏书贵在实用，选择上必然会避免漫无边际，无所不包，而注意选择和自己学术研究有关的图书，这样，经费上能够把有限的钱用在选购有实用的图书上，藏书体系得以更加系统完整，主次分明。

图书利用的基础是本馆（本楼）有必备的、完整的藏书。但是，要形成有效的、实用的藏书体系，在图书购求上就必须思想明确去收藏，有目的做到日积月累，所以，“利济学术”的标准，不仅保证了藏书购求目的明确，而且也保证了图书利用的基础。

“利济学术”的标准，还有利于图书整理，因为收集了这些方面的图书，并有利于自己的学术研究，藏书家对图书必然加以珍护，千方百计的加以揭示，以便利用，想尽办法加以保藏，以保证长期使用。

（二）藏书整理的问题

作为一个私人藏书家，除了收藏到数量多，版本好，质量高的各类图书，还必须对图书进行科学的整理，才能提供使用，长期保存。孙庆增的藏书经历中，最可贵的就是不仅注意收集藏书，而且不断在藏书整理中提高藏书质量，使之精益求精，好上加好，并把这些整理办法加以系统化，这样在古典图

书馆学著作中达到了把工作方法总结成理论著作的高度和深度。

我国书籍校勘工作历来已久，特别是汉代刘向父子校书的工作程序和工作经验，在历代官府藏书中不断臻以完善。私人藏书注重校勘工作也是代不乏人的，但是，他们的整理工作并未加以总结。孙庆增总结前人的成果，又在与朋友交往中讨论研究，吸收旁人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藏书整理工作的系统方法。

“校讎书籍，非博好古学，勤于看书，而又安闲者，不能动笔校讎书籍。”（《藏书纪要·校讎》）从校讎书籍的要求，孙庆增首先提出了校讎的人必须是“博学好古”之士，这是正确的。纵览我国校讎工作发展史，凡是那个朝代校讎工作成绩卓著，往往也是参加校讎工作的人是博学好古之士，刘向校书，分别由刘向负责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这种办法正如郑樵所总结的“校书专官”。即由某一专门学者校勘某一类图书，因为学术上专攻某一学科的专门家，才能从事于书籍内容、篇章厘定，版本的校勘和鉴别，校勘的书籍才是可靠的。但是作为私人藏书家，除了富有余资，可以延聘通人学者代为校勘者外，大量的还是自己动手的。所以，在方法上就有必要研究了。孙庆增自己又摸索了这样的一些方法。

请教专家。如遇古人有弗可考究，无从改正者，“当多方请教博学君子，善求讲究古帖之士，又须寻觅旧碑板文字，务求藏书家秘本，自能改正。”（《藏书纪要·校讎》）“至于字画之误，必要请教明于字学声韵者，辨别字画音释，方能无误。”（同上引）

共同讨论。“校书非数名士相好聚于名园读书处，讲究讨论，寻绎旧文，方可有成。”（同上引）

多次校改。古人有云，校书如扫尘，应多次校讎、方能无误。孙庆增也认为“古人每校一书，先须细心紬绎，自始至终，改正字谬错误，校讎三四次，乃为尽善。”（同上引）这是从校书的要求出发，力求准确全面无误，必须多次进行。

不同书籍用不同校法。如宋元刻本，校书时不可改字在原书上，需将改正字句，写在白纸条上，“薄浆浮签，贴本行上”。这是为了保护宋元珍本的要求。一般新书，则用校正过善本对临逢行改正即可。至于钞本校讎，用宋元版本、旧钞本来校正，并依旧本行款照式改正，即可得精善之本。

讲究校勘方法。孙庆增认为古人用雌黄校书，因古时皆用黄纸等，故用黄色了无痕迹。现在用白纸，当用白色，当时流行用淡色青田石磨细，和胶做成锭子，磨涂纸上，这种改字方法最妙。

校书的目的，除了作为提高藏书质量的必要工作外，有条件印刷出版，也是减少错误，以免贻误后学的基本要求。因之，孙庆增提出，如果“校正刊刻，非博雅君子有力而好古者不能也。”所以，书籍上板，必要名手校正，方可刊刻，这种主张，亦应加以重视的。

书籍经过多方搜求又经校勘整理，如作为自己的收藏，还要加以装订成册，所以，孙庆增对书籍的装订也是十分重视的。

藏书装订的原则，应以美观实用为原则。孙庆增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藏书纪要·装订》）

孙庆增从装订工序上说明装订之用料、工序、技术要求，大致有如下几点：

准备书面。“用小粉糊入椒矾细末于内，太史连三层裱好、贴于板上挺足，候干揭下压平用”，（同上引）他提出，这种书面须夏天做，秋天用，主要是须待完全干燥最好。

摺叠书页。“摺书页要摺得直，压得久，提得齐”。（同上引）

订书眼。“订书眼要细，打得正，而小草订眼亦然，又须少，多则伤书脑，日后再订，即眼多易破，接脑烦难。”同时，为了装订美观，“天地头要空得上下相趁”。（同上引）

套页与切边。“副页用太史连，前后一样两张，截要快刀截，方平而光，再用细砂石打磨，用力须轻而匀。”（同上引）

订线。“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根订结，要订得牢，嵌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同上引）

贴书签。“书签用宋笺藏经纸占色纸上。”（同上引）

以上就线装书装订方法而言，孙庆增结合自己藏书整理的经验，提出了因地制宜，美观大方的装订方法。在《藏书纪要·装订》中，他出于江南气候对书籍保藏的影响，十分强调的是，不用过分密封的办法，如他提出书籍不用书套，这样既通风，又防虫蛀。其次，如用浆糊裱贴，不仅需注意夏天做，秋天用，而且还加川椒、白矾、百部草末。同时，还强调操作时注意防汗水湿滴书上。对于装帧上的设色，也注意美学观赏的要求，即颜色配套应克服呆板、华丽，而要追求内在素质与外部颜色的和谐。这些看法都是可以借鉴的。

（三）藏书编目问题

孙庆增关于编目的论述，可以看出，首先是总结宋元以来各部书目著录格式后提藏书编目的著录项目，于此作为著录格式，求得书目的项目齐全，以备检阅。同时，他还结合藏书经验，提出建立目录体系，达到管理有条有理的目的。他在谈到编目的要求时说“不致错混颠倒，遗漏草率，检阅清楚，门类清晰，有条有理，乃为善于编目者。”

（《藏书纪要·编目》）按照这种说法，大致是提出了“全”，即能全面反映藏书；

“清”，即门类清晰，方便检阅，据目而知书；考之现代图书馆目录之功能，其目的在于便检查，其范围亦以收藏者为限，其详细则以图书馆之性质为衡，那么，孙庆增提出之编目问题，一方面表明孙庆增已完全把过去分类编目之混淆分别廓清，强调了目录之作用，同时又特别强调目录之实用价值。因此，这里分析孙庆增编目论述之主要成就乃极有意义的。

1. 确定了著录项目。孙庆增在提出编制各种目录中，至于著录项目上，大致可析出如①书名，②著作方式，③版本，④稽核，⑤附注。

如其“大总目录”作为书本式目录的写法：

“某书若干卷，某朝人作，（该写著者、编者、述者、撰者、录者、注者、解者、集者、纂者）各各写清，不可混书。系宋板、元板、明板、时刻、朱元旧钞、明人钞本、新钞本一一记清，校过者写某人校本。下写几本或几册、有套无套、……末后计书若干部，共若干册总数于后。”（《藏书纪要·编目》）

如编“宋元刻本钞本目录”，除照上述格式写明外，还必须注明板刻年代，如“北宋、南宋、宋印、元印、明印本、收藏跋记图章姓名有缺无缺，校与未校。”补充注明“何人钞本，记跋图章姓名，有缺无缺，不借本，印宋钞本，有板无板，校过者书某人校本，或底本临本。”（《藏书纪要·编目》）此之规定即善本书编目格式。

图书馆目录上应载明之事项多种，目的都是为了检阅馆藏，分明不同部次。孙庆增于此确定著录事项。具备了作为目录最主要之①分别书名，②了解著作方式，③说明版刻，④统计书籍数量。也就是说作为了解书籍，提供选择，确定价值，鉴别异同最主要的内容都得以充分的揭示出来。所以，孙庆增的编目论述是我国封建社会藏书编目的总结。

2. 组织了私人藏书目录体系。从详尽而实用出发，孙庆增提出了编制四种目录的建议。

①大总目录——即藏书总目；

②宋元刻本钞本目录——即专藏目录；

③分类书柜目录——即排架目录；

④书房架上书籍目录及未订之书，在外装订之书，钞补批阅之书目录——专用目录。

以上四种目录之用途各异。大总目录是全部藏书的记录，分经史子集编列，各类各种都作全面统计。他的作用是全部藏书的清册，也是财产的记载。因为用的是书册式的，故每门类写完，还保留空白，以备日后增写新得之书。其次为善本目录。这是作为特藏使用的。这里要特别注意的分类书柜目录，即排架目录，即每书在那个部分的书柜分别记载，以便查取。但孙庆增在此，用排架目录兼作借阅之清册，他曾说明“如有人取阅借钞，即填明书目上，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借或取阅，一月一查，取讨原书，即入原柜，销去前注。”（《藏书纪要·编目》）说明在处理别人借阅和还架时，都应用此目录作登记。此法可取之处，在于把书架上的书籍管理有序，并对藏书动态及时了解，故孙庆增称“此本书目，最为要紧。”

（四）书楼设备与藏书保管方法问题。

孙庆增在《藏书纪要》一书中，还论述了书楼设备与藏书保管方法。

1. 书楼建筑问题

孙庆增提出了书楼建筑的要求是“四围石砌风墙，照徽州库楼式乃善。”（《藏书纪要·收藏》）如不能单独建筑一藏书楼，最好另置一宅，将书分新旧钞刻各置一室。这样亦可避免水火之灾。如来往多门旷野之所，或近城市又无空地接连内室厨灶衙署之地，则不应藏书。而卑湿之地，更不能藏书。这种意见，在选择藏书楼址上是最基本的要求。

2. 关于书楼设备。

孙庆增提出书柜书架用料,最好用江西杉木。或以柏、银杏为之。至于如紫檀花梨小木,易于泛潮,不可应用。选用杉木这种意见,可能是江南藏书家经验之谈。明代山阴祁承燠在考虑建筑书楼选用材料时,也选用“建杉”,可以证明。“书架宜雅而精、朴素者佳。”其作法是下隔要高,四柱略粗,不可太狭,亦不可太阔,约放书二百本为率。这都是从通风防潮的要求出发的。

封建社会藏书通用书柜,孙庆增认为书柜装饰也应朴素精雅为妙,书柜门可用名手刻唐句(唐人诗文名句),用白铜包角,这种书柜可分可并,据屋层高下摆置,书柜锁要紧密,锁匙门上可挂小方牌,写明类别,便于检寻。书柜内可用皂角炒为末,研细,铺一层,以防鼠害,书楼地下则用炭屑石灰锅绣铺地,则可防白蚁。柜内放春画辟蠹石,可辟蠹鱼。这些措施都是保护藏书的经验。

藏书保管上还要注意曝书的问题,孙庆增在《藏书纪要》中提出了特置晒书板,其用意是书在伏日阳光下晒后,不应立即入库,将书板搁至通风处凉透,方可上楼,而如遇雨,则可把书板扛到屋内。同时,他对曝书还提出按柜数日挨次晒,一日一柜,主要也是防止散乱。(《藏书纪要·曝书》)

孙庆增主要活动于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他撰写的《藏书纪要》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已如上述。那么,应该怎样看待这部著作,或者说它在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上应有什么地位呢?

长期以来,由于封建官府藏书的封闭性,而且当时社会生产能力和行政管理上还未能形成图书馆发展网络,读者应用图书的范围一般只局限于经史各类,以应付封建科举考试,所以,图书馆(这里包括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和各地书院藏书)工作内容上偏重于只是图书收集,整理的内容,这种情况必须

促使当时图书馆学的内容是以收藏、整理为主,一定的实践基础只能产生出总结经验性的认识论,这就是为什么我国长期封建社会图书馆学只能停留在经验图书馆学的水平上。孙庆增的《藏书纪要》可以说是经验图书馆学发展的最成熟的著作,即封建社会图书馆学的集大成之作。

“因名求实”,所谓“藏书”,在十九世纪以前,从我国习惯用语来看,即指按要要求积累的系统藏书,而不是现在理解的图书馆收藏的各类图书,因为当时,图书馆一词并未进入我国。私人藏书用×楼×阁,官府藏书多称×院×阁。即用具体名称说明具体事物,作为收集图书,校勘整理提供使用的这一工作过程和表示这一具体事物,一般都应用“藏”,如周永年为了建立儒学内容图书体系,称“儒藏”,与历史上用释藏、道藏称呼佛教、道教内容的藏书系统一样,同时,也有称藏书的,从这点可以明白,孙庆增这里用藏书作为它的著作名称,就是具有犹如现在图书馆的概念,因此,《藏书纪要》一书,就是图书馆管理概述的意义。

《藏书纪要》具有比前代图书馆学著作更全面更系统的特点。所谓更全面、更系统,就是说其论述问题上处理好局部和整体,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能够提供人们对某个事物认识上更加本质的说明,这一点从孙庆增与郑樵比较,就可看得更清楚了。郑樵结合私人搜求藏书的经验,写成求书八法的理论。当然比之前人眼界更高,但郑樵在图书馆学上的贡献在藏书上只是囿于私人所见所及,解决了方法上的问题,而孙庆增则在藏书收集上说明购求之六难,这是在购求方法上和购和藏的矛盾上总结的,购书要讲方法,才能得到好书,但购书还要讲“好”,“全”、“善”,才能说是会购求,沿用现代的说法是从藏书体系的建立上,从读者阅读的需要上讲明藏书建设,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孙庆增的求“好”、求“全”、求

“善”，比之郑樵的求书八法是前进了。孙庆增的全面观点还表现在图书馆目录的编制上，郑樵只提出了图书应严格分类排比，加以著录提供使用，但孙庆增在藏书存在品种各异、版本有别的情况下，特别要提供读者借阅上的角度上，要求编制不同的目录，并详列出著录项目和内容，这当然也是图书馆工作日趋复杂，工作程序和管理方法要求合理化的情况下出现的并加以总结的。

孙庆增的《藏书纪要》共分八则，总而论之，包括了封建社会藏书收集、鉴别、整理、保管的工作过程，充分体现了作为一本图书馆管理技术书籍的系统性。这是超过前代各种图书管理著作的。前述《藏书纪要》之内容与价值，已经说明，兹不赘述。

如果全面地评论《藏书纪要》这部著作，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在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上，该书是没有把图书馆技术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的，只是围绕图书馆管理技术方法上叙述，因此，就聚书、鉴书各条，其理论化程度还赶不上明末祁承燾之《澹生堂藏书约》。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藏书纪要》只是作为图书馆管理技术的专著，就鉴别而言，宋板元板书亦有工粗之分，同样亦有鉴别好恶的必要，孙庆增对宋版元版，无一字之评论，这也是欠全面的。至于其中渗透着封建迷信的成份，如说书中供血经，可以辟火，亦是不足取的。其提出曝书须在伏天，似不如叶德辉八九月秋高气清曝书正宜之说为是，也就是说，其所列举方法，有些应因时因地而异，这也是应该注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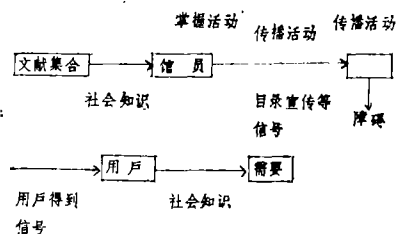
(上接第60页)

对文献进行加工，使文献集合体的结构有序化，便于利用。近来甚至对知识本身进行加工，如文摘，索引的编制，减少交流中不必要的障碍，直接实现知识—读者，而不是知识—检索—读者的通迫。读者工作通过组织服务把文献传到用户手中，使社会知识得以利用。目前通过开拓服务范围，图书馆已经为潜在用户服务，使图书馆传播功能大大加强。读者工作还通过阅读辅导、参考咨询、读者教育、文化活动等服务形式促进读者对社会知识的利用，并从中接受反馈，提高传播的针对性。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写作本文的目的，是要提倡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科学规范，区分图书馆哲学和科学图书馆学。最后提出一个基本理论模式供讨论，这一基本理论模式可简单

地用下图表示：



上图是图书馆活动解剖图，图书馆交流的内容是社会知识，馆员经整理变为服务、掌握和传播，从而克服障碍，产生用户可接受的信号，用户在得到服务过程中是有障碍的（如用户教育程度、服务态度等都会构成障碍）。用户接受了服务后，最终要把获得的知识用以目的地（满足学习、工作、娱乐等需要）。科学图书馆学要研究这一活动中的各种问题和相互关系，建立起一套理论。